

QINGDAI WUFU WENXIAN GAILUN

清代五服文献概论

邓声国 著

本书是迄今为止第一部系统研究清人『五服』文献的学术论著。作者立足于传统文献学研究角度，对清代『五服』文献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清代“五服”文献概论

邓声国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五服”文献概论/邓声国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

ISBN 7-301-08606-7

I. 清… II. 邓… III. 葬礼—服饰—文献学—研究—中国—清代 IV. G25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1681 号

书 名: 清代“五服”文献概论

著作责任者: 邓声国 著

责任编辑: 王 平 王业龙

标准书号: ISBN 7-301-08606-7/K·037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7

电子信箱: pl@pup.pku.edu.cn

排版者: 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51736661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223 千字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例 言

一、鉴于直至目前,清代“五服”文献的研究仍然较为粗疏,与清代其他经学文献的研究相比,尚存在一定的研究广度及深度差距,故本书试图向学界提供一个创新性的研究体系,促进学界对这一类文献的关注和研究。

二、对清代“五服”文献的研究,牵涉范围广,内容众多,历史学、民俗学、人类文化学等不同学科学者皆可参与这一课题研究。本书主要从古典文献学所涉相关方面入手,融个案研究与史论于一体,展开专题式的探讨,更多属于民俗文献学研究的范畴。

三、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清代前、中、后三个阶段“五服”研究的全貌,本书前三章分设“概述”一节,力求对各阶段“五服”著述情况、治学特征及文献学体系诸方面发展状况加以介绍,有时亦酌加评论不同阶段治学得失,务使读者对清代“五服”文献学发展史的线索有清晰把握。

四、为了行文简便,本书凡援引《丧服》篇经、《传》及《记》文,皆不注明文献版本。另外,东汉郑玄《仪礼注》、唐贾公彦《仪礼疏》等常见论著,称谓时一般用简称,如称郑《注》、贾《疏》等。其他清人“五服”文献,首见时举其全称,本节内复见时,一般亦用简称。

五、囿于篇幅所限,凡清人“五服”文献研究不具特色者,本书不复逐一介绍,仅在前三章“概述”部分提及;凡曾经研览而不引录其文的《仪礼》研究综论性著作,本书行文中亦不逐一交代,但求简便而已。

六、凡引文所属文献出现次数较少,或不涉及“五服”研究者,均在脚注下兼注版本情况;至于论述中提及的清人“五服”文献,及其他相关文献重复出现次数较多者,则其版本信息参见本书《主要参考文献》部分。各脚注中注明之引文卷、页情况,除特别声明外,皆系依据该参考文献所注版本论著。

七、书后附录凡五则,第一则附录主要胪列清人文集中的“五服”成果,后四则附录或列举清人文献卷次要目,或钩辑清人所补“五服”条文,借以反映清人的辑佚成就。

八、本书写作中参考了一些今人研究成果,凡属于今人研究中较为显著的发明,著者在论述中必一一揭举注明,以示不敢掠人之美。

九、本书论及文献整理体式时,主要依据冯师浩菲先生《中国古籍整理体式研究》及《中国训诂学》二书,少数体式名称(如“删改体”之类)乃著者所创,非敢故意标新立异,一以准确显明该体式特征为要归。

目 录

导论	(1)
----------	-------

第一章 清代“五服”研究概说·清前期的“五服”

制度研究	(8)
第一节 概述	(9)
第二节 汪琬的“五服”研究	(21)
第三节 徐乾学的“五服”研究	(24)
第四节 朱建子的“五服”研究	(32)
第五节 孔继汾的“五服”研究	(37)

第二章 清代“五服”研究概说·清中期的“五服”

制度研究	(45)
第一节 概述	(45)
第二节 程瑶田的“五服”研究	(56)
第三节 褚寅亮的“五服”研究	(62)
第四节 崔述的“五服”研究	(66)
第五节 凌曙的“五服”研究	(69)

第三章 清代“五服”研究概说·清后期的“五服”

制度研究	(75)
第一节 概述	(75)
第二节 吴嘉宾的“五服”研究	(86)
第三节 夏燮的“五服”研究	(90)

第四节	于鬯的“五服”研究	(95)
第五节	张锡恭的“五服”研究	(100)
第四章	清儒“五服”制服原则及义例观考论	(106)
第一节	清儒“五服”制服原则考溯	(106)
第二节	清儒“五服”义例观之嬗变	(125)
第五章	清代“五服”研究的诠释观与诠释方法	(141)
第一节	清代“五服”研究的诠释观	(141)
第二节	清代“五服”研究的诠释方法	(150)
第六章	清儒《丧服》篇经传整理概况	(165)
第一节	《丧服》经传记撰作问题考述	(165)
第二节	历代《丧服》文献之校勘实践	(184)
第三节	“五服”文献之纂修汇编实践	(206)
第四节	前人“五服”文献之辑佚实践	(219)
第七章	清儒《丧服》篇之文献诠释	(226)
第一节	凡例体“五服”文献训诂实践	(226)
第二节	图解体“五服”文献训诂实践	(231)
第三节	笺疏体“五服”文献训诂实践	(237)
结语		(245)
主要参考文献		(247)
附录(一)	清人文集“五服”篇目索引	(251)
附录(二)	《读礼通考》“丧期、丧服”目录	(259)
附录(三)	《礼书纲目》“丧服”卷要目	(265)
附录(四)	《礼经本义》辑“丧服”条目	(273)
附录(五)	《仪礼经传外编·丧服补》补辑“丧服”条目	(276)
后记		(281)

导 论

近几年来,中国古代礼俗文化的研究逐渐得到学界同仁的重视,这方面的论著也在逐渐增多,这是一个非常可喜、值得倡扬的学术现象。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礼学著作,自它们诞生之日起就一直被研习不断。虽然不同朝代重视的程度存在轻重之别,但迄至清代从无断焉,即使是文古义奥、向称“绝学”的《仪礼》学研究,前人留下的相关论著也非常之众,因而礼学研究确实值得我们重视。《仪礼》一书在“三礼”中的位置非常重要,用宋代学术大师朱熹的话说,就是“《仪礼》是经,《礼记》是解《仪礼》”^①。清初学者李光地也说:“礼有经有传,《仪礼》,礼之经也;《礼记》,礼之传也。”^②至于与《周礼》的关系,清人方苞曾经明确指出:“《仪礼》所详,礼之细目也;《周官》所布,礼之大纲也。”^③稍晚于方苞的清初学者蔡德晋也表达过与之相类似的想法:“《周官》为礼之纲领,《仪礼》为礼之条目。”^④

至于《仪礼·丧服》篇研究,它在《仪礼》学乃至礼俗学史中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意义和持久的生命力。之所以如此,正如清代经学

① 朱熹:《朱子语类》卷八十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② 李光地:《礼记纂编序》,《榕村全集》卷二十,道光九年刊本。

③ 方苞:《仪礼析疑》卷八。

④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三,中华书局1993年版。

大家皮锡瑞所说的那样,是因为“古礼最重丧服”^①。就《丧服》篇本身而言,它反映的是我国周代丧葬礼俗中的丧服制度情况,它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特别规定了在丧礼中生者为死者服丧的各种服饰规格式样以及具体的服丧期限,并且借此形成了一套系统的“五服”制度,包括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个大类。确切地说,它是周代宗法伦理制度在丧礼服饰上的体现,后来被推而广之,在我国古代社会发挥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各个朝代统治者在制定本朝俗礼之丧服制度时,都要参考和借鉴《丧服》篇的规制,由此形成了一门具有深厚历史渊源的专门之学——“五服”学。

清代是一个传统文化研究高度复兴、研究成果极为丰硕的时代,礼学研究在当时得到了蓬勃发展,由此进入了礼学史上最鼎盛的时期。“五服”之学作为礼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迎来了研究的辉煌阶段,它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焕发了新的生机,给后人留下了累累的研究硕果,从而构筑了一道“五服”学研究的话语平台,深受后人关注。对清代“五服”文献进行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入手,本书主要强调从那些传世的“五服”文献挖掘入手进行研究。鉴于目前这类研究还比较粗疏,本书权以《清代“五服”文献概论》为题。以下,对本书的研究对象、内容、断限和分期、性质、价值等问题做一番概括。

一、本书的研究对象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清人留传下来的所有“五服”文献,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纯粹的“五服”研究专著,如毛奇龄《三年服制考》、毛先舒《丧服杂说》、程廷祚《丧服琐言》、华学泉《仪礼丧服考》、姜兆锡《古今丧服考》等专题性礼学著作。这类专著仅仅将“五服”作为研究话题。另一类文献是《仪礼》研究综论性文献,即在《仪礼》十

^① 皮锡瑞:《经学通论·三礼》,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39页。

七篇诠释中包括“五服”研究的内容。^①今天我们讨论清人的“五服”研究状况,当然应该兼顾这两类文献。

从现代文献计量学的理念来看,以上两类“五服”文献可以细分为几个不同的文献类级,即分属于二次文献、三次文献、四次文献等不同类级。《丧服》篇经、传及历朝制定的包含丧服制度在内的礼俗著作(如《太常因革礼》、《大明集礼》)属于一次文献;张尔岐《仪礼丧服经传并记》、庄有可《仪礼丧服经传分释图表》一类著作属于二次文献,重在具体整理、注释《丧服》经、传条文;叶大庄《丧服经传补疏》、张锡恭《丧服郑氏学》一类著作属于三次文献,这类著作除了要诠释《丧服》经、传条文外,还要考察前人二次文献中考证的是非得失;其他依次类推。通过这种分级分类,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把握清代“五服”学研究的发展状况,了解当时“五服”制度研究的学术结构及与此前研究的纵向联系。

二、本书的研究内容

本书的研究内容是清代“五服”文献中所牵涉的各个方面的情况,虽然与《丧服》篇记载的“五服”制度密切相关,但“五服”制度本身并非本书的研究内容,书中所关注的主要是清人在研究《丧服》篇经文及其“五服”制度时的价值取向、诠释观、方法论、义例观、整理视野以及研究成就等多方面的话题,既强调文献的解读,同时又注重研究史的梳理,以便借此反映清代“五服”制度研究的全貌。当然,也要联系《丧服》篇及相关礼俗原典的文化阐释,但毕竟是从属的,不是主要的。

^① 除这两类“五服”文献外,清人文集中也保留了一批“五服”研究成果,鉴于这一部分成果较为零散,本书将不设立专门章节进行论述。这些“五服”单篇论文大致情况,请参考本书附录(一)。

三、本书的研究断限

本书所论各种“五服”研究成果,皆出自清人的论著。本书所谓“清代”,与历史朝代相当,大致从清军入关福临嗣立改元顺治那年(1644)算起,其后又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诸朝,一直到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为止。开展清代“五服”文献研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学术分期问题。笔者在研究清代《仪礼》文献学史时,曾结合清代礼学著作的研究内容、研究风格、著述形式及其礼学思潮等多方面因素,将清代《仪礼》文献研究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萌发期、兴盛期、衰微期。其中萌发期从顺治元年(1644)算起,一直延续到乾隆二十年(1755)前后。兴盛期则从乾隆二十年之后算起,延续到道光初期。衰微期始于道光10年(1830)前后,一直到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推翻清廷统治为止。另外,考虑到学术著述出版的滞后性,1911年之后几年问世的少数论著亦应归入衰微期。从清代的“五服”研究情况来看,它的学术分期同清代整个《仪礼》史的情况相当,本书亦基本上遵循这一分法,只是提法略有不同,换用清前期、中期、后期之称而已。

四、本书的研究性质

丧服制度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课题,它牵涉的范围广,内容多,这种研究可以是传统经学层面的,也可以隶属于某些现代学科的研究层面,如历史学、人类文化学、民族学、民俗学等诸多学科皆可介入其中。事实上,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凭借该学科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参与到讨论中来。当代学者丁鼎先生在谈到古代丧服制度这一独特文化现象诸多学科的研究状况时,曾经打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如果我们把拥有丰富的研究手段和深刻的认识能力的历史学作为这一研究工程的纵向坐标,那么,文献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则可以为我們提供

有效的横向坐标。”^① 它形象地描述出诸学科在丧服制度研究中的相互关联。

本书以清代“五服”文献为研究对象,从传统文献学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入手,通过具体笺注、图表解读,将个案研究与专题论述融合为一体。譬如本书第六、第七两章,就带有明显的文献整理风格,事实上其他各章同样如此,亦皆强调文献的具体解读。另外,由于“五服”制度本身属于民俗学的内容,研究前人的“五服”论著就是对民俗文献的再解读,要考察前人解读的准确与否,分析他们诠释的基本理念和方式、方法,梳理出他们研究的价值观及其总体成就,因而这种研究实质上又带有民俗学史探究和民俗学学术因素挖掘的性质。有鉴于此,本书更多地属于民俗文献学的范畴。^②

五、本书的研究价值

在中国儒家学术发展长河中,清代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那么,清人的“五服”学在整个清代经学史上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如何看待这种学术研究的现代研究价值呢?客观地说,这是当代礼学研究者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

(一)就整个“五服”学思想史的发展来说:自《丧服》篇经、传广为传播以来,特别是汉代以来,“五服”制度的研究一直深受学界乃至统治者的瞩目,一些学者甚至参与到本朝(或本族、本乡)丧服制度的编制活动中去,借以构筑自己理想的丧服文化,并且将这种学术研究和躬行实践相结合,致力于该时代丧服文化的重新建构。

① 丁鼎:《〈仪礼·丧服〉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② 近年来,笔者提出了建构“民俗文献学”这样一门交叉学科的设想,强调一方面要加强该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同时也要加强专题文献民俗学、专书文献民俗学的具体抽绎、整理和研究,突出强调将传统文献学的研究与民俗学的发掘结合起来。有关该学科的一些具体认识,请参邓声国:《21世纪中国古典民俗文献学研究展望》,载《民俗研究》2003年第2期。

就清代的丧服制度研究而言,特别是从清初的研究情况来看,丧服制度的研究更能体现经世致用的价值观。由于“五服”制度是宗法制度的产物,包含了大量的政治思想、伦理思想等,受时代变迁及学术视野诸方面因素的制约,人们的政治思想、伦理思想等必然会有所变化,“五服”制度必然成为这种思想变迁的晴雨表。这种思想变迁往往就隐藏在具体的笺注材料之中,因而,加强不同时期不同学者的“五服”学研究,有助于对当时深层社会内涵的动态把握。

(二)就整个经学史的发展来说:包括“五服”学在内的《仪礼》学研究,与其他儒家经典的经学研究存在很大的差异。例如《仪礼》学研究史上的“宋学”,与传统经学史上的“宋学”概念就不一致,它很少体现为一种义理因素的张扬,与《仪礼》学研究史上的“汉学”概念之间差异很大。例如朱熹、黄幹等朱门《仪礼》之学就纯粹属于汉唐注疏之学,与朱氏的《诗经》学研究诠释观念及治学手段相差很大,并不属于《仪礼》学研究史上的“宋学”范畴。《仪礼》学研究史上的“汉学”与“宋学”之分,更主要着眼于研究手段、研究方法及治学严谨程度的不同。以元代敖继公、明代郝敬等为代表的《仪礼》学研究,才是《仪礼》学研究思潮中的“宋学”流派。进入清代以后,这种“宋学”影响首先体现在姚际恒、万斯大、毛奇龄等“创发新说”派代表身上。另外,李光坡、方苞、蔡德晋、盛世佐、沈彤、吴廷华、马驷、任启运等清初淹通汉宋派的代表人物,也汲取“汉学”与“宋学”各自所长,对清初《仪礼》文献学研究的影响很大。受其影响,清代的“五服”研究也体现出这种治学特点,因而通过加强清代“五服”文献的研究,有助于帮助我们客观而准确地把握清代经学史及整个经学史发展的共性与个性差异所在,这方面的价值尤为重要。

(三)就个别学者的研究来说:在清代《仪礼》学乃至整个经学发展史上,许多学者往往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而被忽略不论。以“五服”研究的学者来说,例如毛先舒、严际昌、华学泉、陈天佑、汪

士铎、孔继汾、吴嘉宾、叶大庄、曹林等人，他们对清代“五服”学的重建是有一定贡献的，但如果站在整个《仪礼》学史及更高的经学史整体来看，人们不可能充分彰显他们对“五服”研究的贡献；又如清末著名学者俞樾，后人虽然在讨论清代经学、小学史时不会忽略不论，但事实上人们基本上不会论及他的《丧服私论》一书。凡此种种说明，通过对清代“五服”文献的研究，更可以彰显个别学者治学的方向及其研究业绩，发掘他们的学术闪光之处。

（四）就民俗文献学的建构需要来说：作为一门专科文献学，同文学文献学、经济文献学、历史文献学等学科一样，民俗文献学是顺应学术发展的产物，体现了学科交叉发展的趋势。众所周知，民俗文献学与文献民俗学有很大的不同之处。要建构这样一门新兴学科，第一步工作便是历代民俗文献的整理和挖掘，本书便是对清代《丧服》文献研究的一个成果。因而，本书的研究无疑将有助于民俗文献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六、本书章节设置说明

除“导论”外，全书共分为八章：前三章，主要讨论清前期、中期及后期三个阶段“五服”研究的概况，并列举数位名家“五服”研究的治学特色及其贡献；第四章，着眼于清人对于“五服”制服原则及义例观的讨论，也就是对“五服”制度的理性认识；第五章，着重探讨清代学者进行“五服”研究的诠释观，以及研究中所反映出来的各种治学方法；第六、第七两章从传统文献学的层面出发，集中探讨清人“五服”文献之辨伪、校勘、编纂、辑佚和训诂情况，其中有关训诂方面情况，则具体考察了三种训诂体式（凡例体、图解体及注疏体）的代表性著作，具体展示清人对“五服”文献的诠释状况。通过以上各章的论述，试图展现清代“五服”文献方方面面的情况，促进学界对这一类文献的关注和研究。

第一章 清代“五服”研究概说·清前期的 “五服”制度研究

《仪礼》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也是中国礼仪节文之上源。古有所谓“五礼”之说，《仪礼》十七篇中就叙述了周代吉礼、宾礼、嘉礼、凶礼的规制情况，唯缺军礼。其中，“凶礼”又称“丧礼”，凡四篇，即《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诸篇所叙仪节、位次极为繁复，从古代丧礼服饰到死后丧葬仪节，再到举行虞祭正礼，每一仪式过程都有详细的规定，大致反映了古代的丧葬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丧服》篇经传是我国古代丧服制度的奠基之作。它根据人物之亲疏差等，规定了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等五个级别的服饰规制，由此形成了我国最早的“五服”制度。它具体论述了各种服制所对应的丧期、服丧主体与服丧对象，此后历代学者研习不断。另外，《丧服》篇的规制情况一直影响着历代丧俗的“五服”制度情况，制礼者往往参考其中的丧服规制，藉此作为制定俗礼之依据，由此形成了渊源深厚的“五服”之学。《丧服》篇所论斩衰、齐衰等各种“五服”制度变异纷繁，颇难寻绎，因而在历代礼学研究中，围绕该篇“五服”制度展开的讨论非常热烈，一批批研究者给后人留下的此类成果极为丰富，有清一代的“五服”研究亦同样如此。本书前三章各节，试图从史论及个案研究者的考察入手，对清代“五服”研究的历史，做一简要追溯。

第一节 概 述

一、“五服”学兴起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一个朝代有一个朝代的学术,然而同一朝代不同学术阶段之间同样存在发展的不平衡性。今天我们审视清初“五服”研究发展的脉络及其走向,不能不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学术自身发展规律进行综合考察,探讨各种时代因素、学术因素对当时“五服”文献研究的影响。就清初“五服”学情况来看,它的兴起与当时的社会更迭和学术思潮变迁有很大关联。

(一) 明清社会更迭与“五服”学的兴起

明清社会的更迭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可以往上追溯到明万历十一年(1583)清太祖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兴兵,下则迄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消灭亡明残余势力统一台湾。^①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朱明王朝走完最后的历史舞台,正式宣告结束,而满洲贵族则取而代之,入主中原,并于这一年十月清世祖宣布定鼎燕京,从此拉开了清王朝统治的序幕,而满汉民族矛盾也就此上升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明、清政权的更替,首先引发了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对抗,各地抗清斗争因强烈的民族情结而变得日趋高涨。连年战争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是经济和思想两方面的动荡,其中思想上的动荡不安现象,又突出集中在士人身上。顺治初年,多尔袞摄政,为寻求社会稳定和维护新政权的统治,实行笼络士人政策,一面极力招纳前明降将,一面开科取士,禁锢思想,网罗文化人才。顺治十一年至康熙十年,文化高压政策极盛,一度曾连年发生科场案。康熙即位初年,鳌拜等又大兴文字狱,有志士人多遭加

^① 这里系采用当代学者陈祖武先生的看法,参陈祖武、汪学群:《清代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害,引发汉人之强烈反抗,统治者遭遇重挫。康熙十一年(1654)以后,清廷意识到有必要调整文化政策,又开始采取以争取为主的宽松举措,笼络汉人学者,扩大科举录取名额,并于康熙十八年(1661)开设博学鸿词科,罗致了全国名士一百余人。雍正登基后,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大施淫威,频兴文字狱,连续发生汪景琪狱、查嗣庭狱、吕留良狱等。乾隆弘历即位后,又先后开设了三礼馆和四库馆,借此笼络文人,但这只不过是表面上标榜提倡汉人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而已,在统治过程中仍实行文化高压和思想禁锢政策,他曾下令大肆禁毁书籍,并连续烧书24次。根据史料记载,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曾兴起大小文字狱达120多次。由此看来,清代前期对汉族士人的政策递变,经历了由利用到高压到怀柔,又由怀柔转为一意压制的过程。这一文化递变和两手政策,使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回避政治,埋头于没有社会风险的学术研究之中,这就为后来经学考据之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温室环境。以《丧服》篇经传为主体研究对象的“五服”研究,连同整个《仪礼》学研究,主要属于一种礼俗仪节方面的研究,较容易远离当时的政治思想斗争,成为学术研究的避风港。

从清廷统治者的角度来看,连年的征战使他们所直接面对的,不仅仅是经济的萧条和国力的贫乏,更重要的是礼制败坏的局面。清初社会礼俗秩序严重错乱,逾越礼制的现象日甚一日,正如魏裔介所说的那样,“丧事之家,尽耗资财以供焚毁,斋僧念忏,婆婆跳神,不厌数四,创寺建塔,聚众号呼”^①。从巩固政权、维系人心的需要出发,清政府必然要重整社会民俗和礼制文化,如果坚持用满洲本土风俗加以规范,只能再一次引发地方异己势力的奋起抗争,加剧社会的动荡。经过痛苦的抉择,清初统治者最终还是选择了儒家传统礼俗文化,用以作为规范百姓思想行为的基本准则,以礼

^① 魏裔介:《兴教化以正风俗疏》,《皇清奏议》第一函卷九。